

序说魏晋南北朝时代

两大盛世之际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三百六十九年间(220～589)，除了西晋时有二十四年(280～304)的短暂统一外，国家处在分裂状况中，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少数族入主中原的政局，这两点，是崇尚大一统的正统观念不能接受的。于是埋没在汉唐两大盛世之间，处于谷底位置上的魏晋南北朝入了另册。这一历史的曲折，是对秦汉以来确立的专制体制的焚坑党锢政治和晋室的至私政策的惩罚。

那个时代确曾是一个悲惨世界，有一切中世纪黑暗的特征，有太多的眼泪和死亡。然而，付出了不堪回首的代价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为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经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族纷争血的洗礼再造的中华民族，有了更强健的体魄和宽广的胸怀；吸纳了佛教的中国文化，具备了枝繁叶茂全面繁荣的基础；挟带着佛经的优势汉文化东渐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汉文化圈和东方帝国的雏形开始发育；经历了禁锢和屠杀的苦难，中国人开始了关注个人命运的觉醒和思考。

甚至分裂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留给中国的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它昭示天下，在中国本部，分裂只意味政权的分立，而不是传统国家的消亡。三分天下的魏蜀吴三国，不仅均无自外于中国的观念，反而都曾为重建统一的中国而奋战。曹魏蜀汉之间的恩恩怨怨更纠缠着谁为正统的唇枪舌战。南朝和北朝各政权，尽管敌视地互称对方为夷狄、岛夷，却又为争谁是正朔所在而虎视眈眈。和尔后中国史上出现过的分裂一样，分裂从未中断中国的历史，反而往往成为打破统一的表象下充斥的停滞、僵化、腐败、反动的一种机遇，各分立政权的互相竞争和民族融合激活了历史，成为走向新的更高统一的一段过渡。三国开创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去合来总归还都是中国的传统。这裂土而国祚不殒的政治遗产，提供了一个模式，为后代分裂时期仿效，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它似可从独特的政治文化层面上揭示一个秘密，为什么古代世界五大文明的其他四个均没落中断，唯有中华文明悠久绵长，得以延续至今。

持统一和分裂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的观点，本卷在论述魏晋南北朝这个分裂时代时，将摒弃把统分问题作为历史评价基本标准的旧史传统。既然“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语）我们应当承认，每个人对自己目的的追求和进取精神，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并应当循这一思路，把评价历史的视角定位在当时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多少空间和为各地区

及整个国家的进步提供多少机遇取得多快速度之上。换而言之，是以这样一个环境标准，即提供给所有男男女女的为国家民族的持续发展进步和自身物质的精神的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提供了多大活动空间，作为对那个时代历史作价值判断的根本准则。

疆域与环境

疆域版图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国家民族的发育成熟逐步形成，在近代各国边界逐渐以条约形式确定和稳定之前，领土的争夺和变动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版图与汉唐有别，更与近现代中国不同，但又是今日中国版图形成期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当时的版图，我们不妨使用本部、周边和外域三个政治地理概念加以区别。本部较稳定地处在历代中国的疆域内，周边是本部和外域之间游动于疆域内外的地域，其中有许多藩属国和归属不定的飞地，对周边的这些地方的征服和争夺，往往引起许多守土和拓边的战争，各中原王朝的辖境随之而进退。历史老人总是借助那些手执刀剑的战士燃起的火、洒下的血，勾勒着、涂改着历史地图。

秦统一时的疆域，东至大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是为中国本土的雏形。汉代经过汉武帝的开边活动，辖郡大大超过承秦的三十六郡或四十余郡，在北边置朔方郡、五原郡，拓境至今内蒙西部；在西边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至甘肃西部，西域都护府管辖的范围更达新疆以西；在南边又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交趾、日南、九真等九郡，达到今越南中部；在东边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至朝鲜半岛北部。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在其辖区为维持两汉的这一疆域版图而努力，各分立的政权也为各自

在内地的地盘而征战不已。周边地区中，西域和辽河以东的争夺反复较多，南北政权的争战多在淮河流域展开，四川的南北归属则不确定。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历代人们活动的历史舞台和社会背景，是否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更好的生态环境资源，积累了更进步更有价值的人文科学文化资源，是我们对任何一个时代作历史评价的主要视角。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把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视为在历史长时段的时间内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把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等周期性的经济消长形成的局势，视为在历史中时段的时间内起有节奏的重要作用的因素。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历史观，是对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必然受到一定的现成条件制约的一种不错的说明。本卷将重视一些长时段、中时段因素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影响。除上述关于统分的国家观和疆域外，这里先就气候、人口和门阀政治的时代性特征，作为历史背景简略交代。

竺可桢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通过对于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资料的研究证明，人类历史时期的气候是有变动的。寒冷期和温暖期的交替变化，对物产、人类的生活环境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三国到六朝是处在汉唐两个温暖期之间的低温寒冷期。具体的资料如汉代“橙橙邓桔”，河南南部多橙桔，而曹操“植朱桔于铜雀，华实莫就”，不结果。又如曹丕于黄初六年（225年）去广陵即淮阴视察十余万士兵演习，“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取消了活动，这是所知的第一次关于淮河结冰的记载。在三世纪后半期，特别是西晋太康年间（280～289）的十年，寒冷气候达到了顶点，每年阴历四月还降霜。南朝时在都城建业（今南京）覆舟山建立

冰房，当时北朝占着黄淮以北地区，不可能供给冰块，南京只能就地取冰，而要结足够厚的冰块的话，当时冬天气温要比现在冷 2℃。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的资料说明杏花盛开和枣树出叶比现在要迟四周至二周，当时石榴树冬天不缠裹保护则会冻死。而现在在河南或山东，石榴树可在室外生长，可见六世纪上半叶河南、山东一带的气候比现在冷。气候变冷，霜冻期长，影响农业产量。平均气温每降 1℃，农牧区的分界线要南移近百公里，迫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应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移引起民族冲突和大量人口南迁的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这一自然和社会交互影响连锁反应的历史链，造就了南中国发展的机遇，展示了南方经济会赶上北方的前景。

人口与国土承载力

据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书中经过校正的人口数字，魏晋南北朝以前的西汉元始二年（2 年），全国人口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北中国大约四千万，占三分之二。两汉之间的人口谷底大概是三千五百万左右，东汉的人口峰值超过六千万。东汉三国间的人口低谷应在 220 年三国开始的前后，大致在二千二百二十四万至二千三百六十二万之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强，是中国历史上灾祸造成的几次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结果之一。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从这三千多万以上人口死亡的惨祸中艰难起步。三国末期的人口总数下限为三千万，西晋永康元年（300 年）前，人口可能达到三千五百万左右。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十六国人口的起点数约五百万至六百万，只及原来四分之一左右；南方东晋初人口发展的基点为一千零五十万，到东晋末一百零二年间增加到一千五百七十八万至一千七百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六万。南北朝的北魏正光（520～524）前，人口恢复到三千一百五十万至三千五百万，北周灭北齐后，北朝的人口可能又在三千万以上；南朝刘宋人口为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梁武帝时人口为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一百万，陈境缩小，人口约一千五百万。南北合计，在六世纪二十年代全国人口应不下五千万。魏晋南北朝以后的隋朝极盛的大业五年(609年）时，全国人口为五千六百万至五千八百万，其中北方占三千八百万至四千万，仍是三分之二的多数。盛唐人口的下限为六千五百万，南北为二千五百万与四千万之比，仍是四六开。总的情况是魏晋南北朝人口上下波动，经过四百多年的反复，其中有多次人口下降了一半以上，到隋代才基本上恢复到东汉的最高人口数，南北人口比例又为三比七。按正常情况下一般的每年千分之七的人口增长率计算，四百年人口应增至十六点二八五倍，损失了约百分之九十四。实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是数千万，很可能要数以亿计，正可见战争的酷烈。

不过我们还不能将这亿万生命的死亡完全归罪于阶级压迫、民族战争。在以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千年中，西汉（2年）、东汉（157年）、南北朝(520年）、隋朝（609年）、唐朝(755年），人口数达到五六千万就跌落下来，反反复复了四五次，应该还有生产力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受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水平制约的国土承载力问题，一旦达到五六千万人口，天灾人祸引发的经济崩溃，就会借助战争饥荒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总数强制削减下来，使不堪重荷的土地得到喘息和休养后重新焕发活力，投入下一个周期的作业。入宋以后生产的进步，主要是南方的开发，国土的人口承载力才向一亿人的规模冲击。在此之前人口数字达到五六千万时再三再四地跌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相对安定情况下人口稳定的递增和不可能一直同步增长的国土有限的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当时解决矛盾增加粮食产量

的主要出路是开发南方。魏晋南北朝成为南方经济的重要开发阶段，最主要的还不是北方人口的迁徙注入，而是比较进步的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犁耕的引进，部分取代刀耕水耨比较粗放的耕作方式的成功。这就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人口素质起的作用了。不过国土承载力的提高和宋明以后人口一亿、两亿到清代三亿、四亿的增加还是会产生新的矛盾。人处在物质生产能力的局限又不能控制自身人口的不断增加时，同类自戕的悲剧，便以一次减杀数以千万计人口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或民族战争形式，周期性地上演。明末的农民战争和清代的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每次损减的人口更达八千万和一亿，都相当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全部减损人数。以往永嘉南渡时江南尚有未曾开发的大片土地可安置人口，缓解大量死亡的危机。明清以后，江南经过相对饱和状态的开发，以往那样的避乱乐土已不复存在，于是一二十年内全国人口的急剧下降，达到了千余年前魏晋南北朝四个世纪中死亡的总数。吃人的专制社会的狂暴肆虐愈演愈烈，比较而言，魏晋南北朝战乱造成的苦难反而是小巫见大巫了。

士族门阀政治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体现在门阀制度上。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论述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而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当时开创的“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士族政治的格局，由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兄弟与晋室司马氏共天下，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

唐长孺先生在《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和《魏晋南北朝

隋唐史三论》等论著中全面论述了南北门阀的兴衰。认为门阀制度源于两汉以来的地方大姓势力。由于政治地位和文化修养的优越性，大姓冠族中能够产生名士，有些名士又和武装队伍的豪帅相兼。东汉后期的大姓冠族及其代表人物名士“世仕州郡”,操纵乡论,主持选举,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又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和手中的选举权，通过察举和辟举跨出地方，步入朝廷，甚至“世为公卿”。还荫庇逃亡农民和占有广大土地,在地方是有坚实经济基础的势力，广泛地控制着农村。东汉以来地方大姓势力的发展所体现的历史倾向是门阀专政。从大姓名士中选拔出来的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是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最重家门出身，也同样重当代官爵。曹魏时，只有在中正九品中居于高品(二品)的才能作高官,而获得二品的几乎全部是大姓冠族，所以是门阀贵族政权。西晋是一个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掌握军权，朝廷重用宗室子弟，特别是以之充当握有重兵的地方军政长官的现象，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大致萌芽于曹魏，显著于西晋，下延至南北朝乃至唐初基本未变。这正好与门阀政治的兴衰相始终。永嘉之乱后人们普遍结坞自保，过去东汉的家兵部曲纳入坞堡制度，扩充了门阀大姓兵长坞主的军事实力。这时以河南地区为主的北方士族大量南渡，这些所谓“侨姓”构成东晋政权的核心。魏晋时还不像后来那样的不可逾越的士庶区别,到南朝宋齐时代“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变得最为严格，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士庶又趋于混淆。事物都是在发展到极端时走向反面，南朝的士族高门首先开始陆续失掉他们的军权和政权。东晋末年，统兵镇压孙恩的第一流高门陈郡谢琰被孙恩的军队临阵击斩之后，东晋高门士族中将才竭绝已尽。此后直到陈朝，统兵大将绝大多数出自寒门，高门士族几乎完全丧失了军队的指挥权。也

是在宋齐时期，皇帝亲信的寒人充当中书舍人，专掌军国机要，夺取了至关重要的中书省大权。不仅中央方面由寒人担任将帅，执掌机要，而且地方上也任用寒人为典签，监督军政“威行州郡，权重蕃君”。这是皇帝要限制乃至剥夺高门士族的权力。高门士族自身的腐朽，使他们无法胜任作为统治核心的职责，齐梁时实权已旁落，逐渐转移到地位稍低的士人或寒人手里，但朝政还需身居高位的高门士族点缀，擢才取士，赞礼导传，乃至禅代之际的奉册授玺，皇帝还需要利用他们。宋、齐、梁、陈四朝皇室均出于寒门或低等士族，乐于同高门士族联姻，使江南门阀士族虽然衰落，尚能残喘苟延。最后的三次打击，一是侯景之乱，沉重打击了以建康为中心的侨、吴高门士族；稍后的西魏攻占江陵，将聚居在江陵的荆、扬士族全部虏往北方；隋朝灭陈，再次将陈朝贵族官僚北迁关中。江南高门士族，特别是早就脱离了宗族乡里根基的以王谢为代表的侨姓高门，几乎倏然从江南消失，先于北方士族，退出历史舞台。

北方士族，自永嘉之乱河南诸州士族大批南渡之后，留在北方的居多是河北关中士族，陆续得到各少数士族政权的任用，保持着他们的优越地位和基本权力。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 年）定族姓，使鲜卑贵族门阀化，形成一个在门阀体制下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相结合的统治集团，有效地消除了胡汉统治上层的隔阂。鲜卑族姓的高低全部以祖先在北魏初皇始（396～398）以来的官爵尊卑为准，汉族门阀中甲乙丙丁四姓等第也是按照先世在北魏本朝官爵为标准新定的，与南朝以因袭魏晋高门为主建立的门阀体制有差异。这差异还表现在北朝士族中不乏将才，并始终拥有以宗族乡里为基础的潜在军事实力，绝不像南朝高门那样鄙薄军伍。政治上，北朝出于高门的官僚也不像南朝高门那样放诞不任政事，说明北朝高门还有生命力。东魏

北齐的最高统治核心是出于怀朔镇的军事贵族，而北齐诸王多娶崔、卢、李、郑、王诸姓高门女，后来皇室又自称渤海高氏，表明汉族高门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力量是被承认的，不过高齐无意使新兴贵族门阀化。创立西魏和北周政权的是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镇酋豪，武川系贵族享受着过去门阀的特权，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后裔不少一直居于周隋政权的统治核心。虽然也已出现了门阀体制趋于消灭的历史倾向，但他们在历史上的消失还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饱受崔浩之死、崔季舒被杀案株连、鲜于修礼和葛荣河北起兵、尔朱荣河阴之变的屠杀之苦的山东郡姓，又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决定性地衰落了。唐太宗企图建立的新门阀贵族集团在武则天统治时也瓦解了。到唐玄宗统治时，政治上科举几乎是唯一光明的入仕途径，经济上没有了大量部曲的贵族官僚也很少再有和一般地主不同的特点，门阀制度就到了最后消除的阶段，它的最后衰亡就在武则天至唐玄宗统治的时期。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关陇集团的概念，提供了理解门阀制度最后的历史和西魏北周向隋唐过渡的历史的一把钥匙。

有趣的是关陇集团的矛盾性格。这个以起自代北武川镇庶族寒门军人为核心的集团中，竟出了北周、隋、唐三代皇帝，掌握了西魏、北周、隋和初唐四朝政权。这个集团在士族门阀地主普遍衰落时强化了门阀统治，充当了士族门阀政治的最后支柱，但又不是门阀制度的忠实堡垒，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成员和核心终究不是高门旧族。表现在政策上便是既保守又有革新的二重性，思想上既讲门第又重冠冕，内心深处对旧族高门每有不平，时时又情不自禁地攀附礼敬，这就是他们性格的矛盾表现。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多少怀旧的感情，更多的是革新精神，他们

的主要倾向不是代表过去，而是朝着未来。一面延续前朝的政策，承认门阀并求与之亲合；不时又在施政时表现出反门阀的新鲜内容，最后为结束门阀制度，实现后门阀社会向科举时代的交替过渡，作出开创性的贡献。魏晋南北朝为历史打开辉煌的下一页作好准备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南北统一庆功鼓乐中结束了自己三百六十九年漫长的苦难历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魏蜀吴三国鼎立的龙争虎斗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正月，曹操在魏王、丞相位上病死于洛阳。十月，曹丕称帝，建元黄初，曹魏立国，标志董卓入洛以来军阀混战三十年的前三国时代行将结束。随后，公元 221 年刘备称帝于成都，建元章武。229 年孙权称帝，迁都建业，建元黄武。华夏大地上呈现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之势，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

曹操的政治眼光

如若以 220 年颁行的九品中正法象征门阀官僚政治的确立，这又是经过前门阀时期的秦汉的酝酿准备，中国皇帝时代前期门阀社会阶段的开端。对这样一个大转折的时局有开创之功的曹操，未能摆脱“ 赘阉遗丑 ”的心理阴影，或者还有“ 天下尚未定 ”的顾虑，把登基开国做皇帝

的机会留给了儿子，自己只在身后享用了一个追谥的帝号武皇帝。

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刘夫人所生长子曹昂，早在建安二年(197年）被张绣杀害。继室卞氏所生的四个儿子是曹丕、曹彰、曹植和曹熊。然而最先使他“有欲传后意”的是环夫人所生的曹冲。有名的曹冲称象故事真假难辨，可是载入了《三国志》他的传中。说他五六岁时，孙权送来一头巨象，曹操想知道象有多重，问众人有何办法称量，大家都拿不出主意。小小年纪的曹冲说：把象牵到船上，按吃水的深度刻印，依此印痕把称过重量的重物往船上放，就可以知道象有多少斤了。曹操大喜，当时就让照办，刻舟称象，算出了重量。曹冲也许是想起听说过的印度故事，便道出了这个办法。

使曹冲的神童名声大振的另外一个故事是“智救库吏”。曹操用的马鞍放在库中被老鼠咬了，当时用刑很重。库吏出了差错，生怕自首也不免要被处死。曹冲得知，让他缓三日再自首。自己找件单衣，用刀捅破，好像被老鼠咬过的样子，然后装出一脸愁色，去见父亲。曹操问他是怎么了，曹冲说：人们都认为被老鼠咬了衣服的人不吉利，现在我的单衣被咬，所以忧戚。曹操笑着说：那是妄言乱说，你不用担心。这时库吏进来，报告马鞍被鼠咬一事。心境正好的曹操笑道：我儿的衣服在身边尚且被咬，何况挂在柱上的马鞍呢。遂完全不予追究。

曹冲常常见到面临被罪要遭屠戮的人，就探察有无冤情，尽量为之辩解，前后救下数十人。他有这仁爱的品性，聪明的才智，又“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可惜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冲年仅十三岁就得病夭折了。曹操不胜哀痛。曹丕宽慰父亲，曹操告诉他：“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曹丕明白这话的意思,承认“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这些说明，曹丕、曹植的小兄

弟曹冲曹仓舒，是曹操首选的嗣子。所以叶适《习学记言》说：“操于诸子，将择才而与之，意不专在嫡。”这位枭雄能臣，我行我素，连周公立下的嫡长子继承法的规矩，也不屑一顾。

唯才是举是曹操用人的原则，兴魏的法宝。他完全不理会儒家亲亲尊尊的那一套，他公开求贤，无论出身低贱者、盗嫂受金者、无笃行守信者、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者、不仁不孝者，只要有才能，他都用。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他著名的求才三令中。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九年(214年)、二十二年(217年)的三个令称：

>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业？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

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古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这求才三令呼唤的是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重新发现，对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号角。

曹操本人身体力行，甚至像张绣那样曾与他兵戎相见，并杀害了他长子曹昂的宿敌仇家，他也收用。折服于曹操用人政策的感召力，张鲁竟发誓：“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曹操对儿子也是这样，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以前，他“久不立太子”，就是不愿按嫡长子排位简单行事。他要考察挑选一个最有能力继承他事业的儿子接班。在曹冲之后，曹操曾特别青睐曹植，谨慎地对曹丕、曹植这一对亲兄弟作反复考量，迟疑良久。曹丕处在嫡长位，曹操却“有意欲立植”，这就引发了一场兄弟俩各引党援的嗣位之争。

曹植、曹丕的夺宗之争

作为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曹植，本质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自视甚高，却不是政治家、实干家。起先曹操看到他的文章，不信是他写得出来的，曹植申辩并未请人代笔，自己“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可以面试。正好建安十七年（212年）春，邺城新建成铜雀台，曹操登台命诸子作赋。曹植援笔立成，文章可观，曹操惊异。后来进见时，有事问他，又总能应声而对。更有邯郸淳盛赞曹植是“天人”，杨俊在论曹丕、曹植时，称美曹植，所以曹操对他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植已封侯，十九年（214年）曹操征孙权，命曹植留守邺城，还特别以自己发迹之初第一次升迁的经历鼓励他，说我以前任顿丘令时

是二十三岁，现在你也二十三岁了，要努力啊！按照惯例，帝王出征，太子留守京城，现在曹操破例用曹植为留守，加上那番意味深长的嘱咐，显然是以嗣子位期待曹植。曹操还不慎地向为曹植当说客的丁仪之弟丁廙透露心迹：“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丁廙极表赞成，说：“此国家之所以兴衰，天下之所以存亡”，把立曹植说成是关乎兴衰存亡的大事。还恭维曹操：“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曹植有荀或子荀恽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党羽，曹操一度瞩意，有好几次差一点就立曹植为太子了。

曹丕（187～226）年长胞弟曹植五岁，文才略逊于曹植，却精通诸子百家之书，又善骑射，好击剑，是个全面的人才。“立子以长”的传统使他比较容易得到众多的支持者，其中有庶族人物的代表贾诩、吴质、毛玠、卫臻、陈矫；有来自曹氏故里掌兵的姻亲夏侯渊、夏侯荣、夏侯尚、夏侯楙；有曹操嫔王昭仪等女流，包括“宫人左右，并为之说”；也有清河名士邢颙和清河世族崔琰。邢颙是曹植家丞，与植不合，有私怨转而支持曹丕。当曹操用书函秘密征求臣僚关于立嗣的意见时，别人都密议作答，唯独崔琰故意函不加封，公开露版而答，扬言应按《春秋》之义，立子以长。称赞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表示自己会“以死守之”，决不生二心。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却作出反常的表态，恐怕是面对险恶的嗣君之争，作谋求左右逢源的自安计。但他这样故意公开了曹操暗访立嗣意见的做法，使曹操尴尬被动，后来没有放过他，以腹诽罪赐死。

是什么原因使曹操的心理天平后来又倾向于曹丕一边是个谜。如果说是因为曹植品行不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那么曹丕也是“耽乐田猎，晨出夜还”，

游乐无度的。为王粲送葬时，曹丕竟以亡者好驴鸣，出主意大家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在场的每人都学一声驴叫。不过时尚放荡不羁，还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管束人的言行，曹操不会在意这些小节。曹操留心的是继承他的人，必须有取代汉朝建立曹家天下的事业理想。正是这一点，曹植及其支持者与曹丕迥然有别。曹植有诗明志：“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后来听到魏代汉成了自家天下，反而与苏则等“发服悲哭”，其中兼有不敢背汉的思想，也有要韬光养晦的恐惧感和兄弟之争彻底败北的失落感，心绪复杂。曹植的党羽，有些从他们的父辈起就是扶汉的一派。如杨修之父太尉杨彪，在汉献帝被兵挟持迁许之初的公卿大会上，曾面露不悦之色，曹操见了怕有不测，不等宴会开始就托疾如厕，紧急脱身，逃还本营。丁仪兄弟之父丁冲当时致书曹操，说以匡佐之志，是提醒勿生篡夺之心。荀恽之父荀或公然劝阻曹操称魏公，受九锡，建安九年(204年）就是他打消了曹操复古，置九州，图天下之议。九锡即九赐，是天子赏赐给王公大臣的九种器物，为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宫矢、鈇钺、秬鬯，是最高礼遇，受九锡往往成为权臣篡位的身份和程序，所以荀或极力阻止，以至曹操在荀或死后一年才为魏公。其子荀恽又与曹植亲善，与支持曹丕的夏侯尚不睦，使曹丕忌恨。两汉共有四百年天下，打出反汉的旗帜需要一点勇气，曹操尚且不轻易放弃手中的汉献帝这张王牌，儿子中，唯曹丕有代汉意，这一点最使曹操满意。这是他未竟事业继承人的首选条件。

曹丕有四友：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是他得力的支持者。为首的司马懿，后来在曹魏时是受遗二主、佐命三朝的重臣，一再被托孤辅佐新帝。但曹操生前就看透了他，对曹丕有嘱咐“司马懿非人臣也。”果然他是“前忠而后乱”，打下晋朝基业，死后司马氏竟迁魏鼎，改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